

# 早期国民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贡献及局限性

邢 倩

(山东大学,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早期国民党人是近代中国首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 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宣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社会问题; 为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其阶级局限性, 早期国民党人认识和理解方面存在不足, 未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其马克思主义观具有空想性与古典主义色彩。

**关键词:** 早期国民党人; 马克思主义观; 历史贡献; 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 A 8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4)04-0005-05

## Research of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Early Kuomintang's Marxist conception

XING Qia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Early Kuomintang in modern China is the first batch of intellectuals who introduce the Marxist. Their introduction and publicity of Marxist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They use the Marxist principl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al problems; Lai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first time cooperation. Because of its class limitation, deficient factors of early Kuomintang people understanding and the understanding, failed to grasp the essence of Marxism; The Marxist view has utopianism and classical color.

**Keywords:** Early Kuomintang's Marxist concept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Limitation

### 一、早期国民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贡献

早期国民党人是近代中国首批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传播, 使包括早期共产党在内的国人初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 为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早期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传播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起到了启蒙作用, 也正是受此影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 并最终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早期国民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三民主义, 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总之, 早期国民党

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具体包括两方面:

#### 1. 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奠定了基础

中国人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 要追溯到清朝“外交官们”在出使西洋的过程中留下的对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感性认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也简单的介绍过马克思及其学说, 但这些介绍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政治学派中的一派来加以介绍。在中国开始有意识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 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国民党人, 他们与其他派别的不同之处在于, 是用一种高度赞扬的态度来介绍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前, 早期国民党人以《星期评论》《建

**收稿日期:** 2014-04-23

**作者简介:** 邢 倩(1990-), 女, 山东章丘人,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2 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设》、《觉悟》等刊物为阵地,大力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据粗略统计,《星期评论》共刊登文章四百五十五篇,其中约五十篇是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在大力宣传三民主义的同时,还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觉悟》发表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五十篇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中包括李大钊、陈独秀、包惠僧、刘仁静、陈望道、施存统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些刊物所载文章涉及面广,材料丰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倡导工人运动,受到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的广泛欢迎<sup>[1]98</sup>。五四运动以后国民党人以报刊杂志为载体在中国较大范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期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涉及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首先,唯物史观方面,早期国民党人介绍并宣传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指出“唯物史观的意义简单说,就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人类因社会的生产力而定社会的经济关系,以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定法律上、政治上他们对经济基础决定的关系,更左右其社会个人的思想感情意见。其间社会一切形式的变化,都属于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此立经济一元论的历史观”<sup>[2]268</sup>。还探讨和介绍了阶级斗争理论。其次,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戴季陶翻译了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和《商品生产的性质》,介绍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深入研究了剩余价值学说,分析了资本主义剥削剩余价值的秘密。第三,在社会主义方面,早期国民党人将社会主义划分为集产社会主义和共产社会主义两个阶段。认为“集产社会主义又称国家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sup>[3]36</sup>。早期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较为全面,客观上有利于国人,尤其是先进知识分子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

## 2. 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问题

早期国民党人在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和历史问题。如胡汉民1919年10月在《建设》第一卷上发表文章《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运用唯物史观解析中国哲学史,指出:时势是由物质力量造成的。1920年他在《致马伯援论革命》一

文中提到“社会上许多有知识有血性有良心的青年对社会进行改造,为社会谋幸福,为社会去魔障”<sup>[4]198</sup>。在《阶级与道德学说》一文里指出:“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凡属人间意识的东西,都随人的生产关系,随其社会关系,随其社会存在,一齐变化,物质的生活之生产方法,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一切生活过程。所以,无论关于道德的什么理想学说,都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生活与传统习惯矛盾的结果”<sup>[5]306</sup>。同年5月在《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一文里也指出:“社会改造不能限于一部分,而全部改造须以社会经济的组织为中心”<sup>[6]290</sup>。胡汉民试图运用唯物史观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来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问题。在《政治问题应该研究不应该研究?》一文中指出,要想改造中国社会必须破除官僚政客专横,改造旧的社会组织以解决分配问题。他在《随便谈》中表示支持胡汉民提出的“中国一切思想的变迁都是经济生活的影响”<sup>[7]15</sup>的观点。同年9月在《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一文中,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战争,认为“造成战争的原因是社会生活问题,中国的社会问题的根源是机器制造品的大量输入”<sup>[8]30</sup>。早期国民党的另一位代表朱执信也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分析社会生活领域的社会心理及意识形态变迁问题。1920年6月在《兵的改造与其心理》一文中指出:“兵的心理,几乎可以说,全是兵的生活做出来的。所以要研究兵的心理,就要从兵的生活着手研究。全部改造腐败的中国社会,包括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改造要全部改造。现在我们想改造社会,自然要打破经济的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sup>[9]50</sup>。

综上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早期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客观上推动了当时中国先进分子尤其是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和研究,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激励着当时中国的青年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开始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sup>[10]428</sup>。

## 3. 早期国民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为国共第一次合作奠定了基础

以孙中山为首的早期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赞扬和肯定以及对社会主义的向往符合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新三民主义为国共第一次合作奠定了基础,推动了国内革命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有

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国民党人第一次认识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他们从中看到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革命前途和方向，孙中山指出“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了一个大希望”<sup>[11]97</sup>。他们在高度赞扬十月革命和列宁思想的同时，也渴望得到俄国的帮助。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爱国运动展现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巨大力量。于是，1919年年底，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便支持并参加农工联合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之初便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工人运动日益高涨，国民党人认识到“国民革命运动，必持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工人可以做国民的先锋，做全国的指导，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sup>[12]465</sup>。同样，在与共产党人接触过程中，国民党人也认识到共产党人具有大无畏的勇气和明确的指导思想，并非常敬佩。正因如此，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于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做了重新解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新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这一契合点成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推动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走向高涨。

## 二、早期国民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局限性

早期国民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历史上有过重要贡献，但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及其阶级属性的限制，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观存在局限性。

### 1. 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

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马克思认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成了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sup>[13]15</sup>。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sup>[14]210-211</sup>。因此，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武器，它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而不是为所有的阶级服务。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认识马克思主义，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而先于无产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国民党人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传播马克思主义，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

国民党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代表，其革命目标是在中国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因此，早期国民党人介绍并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从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出发，为实现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虽然他们同情并高度赞扬马克思主义，并积极从中吸取对资产阶级革命有益的成分，以完善三民主义，避免重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覆辙，为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寻求理论依据。但主观上他们并未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更不同意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如孙中山说，他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反对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马克思的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不适合中国实际。戴季陶也表示：“我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想它在苏俄毕竟取得了胜利，想将其也纳入我们三民主义的轨道最少可以取其长”<sup>[15]255</sup>。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也指出“之所以向中国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目的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学说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sup>[16]10</sup>。正因为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所以他们并没有真心实意的去研究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他们赞扬唯物史观却只字不提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宣传阶级斗争学说却极力反对工人罢工，主张资本家与工人“互让”；向往社会主义却不赞同在中国引进并实行社会主义；介绍剩余价值学说却极力掩饰资产阶级追求剩余价值的剥削手段。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仅仅是诸多西方思潮中的一种，并没有完整的接受与运用马克思主义，而是把它作为改造三民主义的工具，正因如此，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只是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总之，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受到很大局限。

### 2. 认识和理解方面存在不足，未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甚至出现错误。

早期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不足。例如马君武指出：“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马氏之徒，遂谓是实与达尔文言物竞之旨合。故社会主义者，不惟不与达尔文主义相反对，且益广其界而补其偏，虽谓达氏主义得社会主义而其义乃完，可也”<sup>[17]11</sup>。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达尔文主义的补充和完善，由此可见，早期国民党人缩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围，未能真正把握马克思的科学内涵。

列宁曾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同其他原理联

系起来加以考察”<sup>[18]785</sup>。早期国民党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均有所涉及,但总体理解比较肤浅,缺乏准确性、系统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括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这三大有机部分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因此,只有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真正发挥其革命性的指导作用。而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受历史条件和阶级属性的局限,没能做到这一点。他们采取了分割的介绍和研究,如胡汉民重点研究了唯物史观,朱执信对阶级斗争学说“情有独钟”,戴季陶侧重政治经济学,而孙中山则偏爱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这种分割、有选择性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做法,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理解。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早期国民党人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甚至在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存在误解。例如,早期国民党人认为,“阶级斗争”这一历史上的重大事实是由马克思最先认识到的,并“从一切历史的社会关系里面抽象了出来”。他们误以为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以前就有人认识到了,阶级斗争学说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他们还认为马克思过分强调物质,而不关注精神生活,指出“马克思一派有人有时说得过分,看成人类心理的变化,完全听命于他的环境。什么都只有被动的适应,没有自动的适应又且看重了物质的生活,就不大理精神生活。”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因为马克思肯定物质决定精神与意识的同时也强调了精神与意识的反作用,认为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马克思不仅重视物质生活,也重视精神生活。他们还批评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为“所有工业生产的盈余价值,不专是工厂内工人劳动的结果,凡是社会上各种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在生产方面或者是在消费方面,都多少有贡献”<sup>[19]782</sup>。“马克思把一切生产劳动的功劳,完全归之于工人的劳动,而忽略社会上其他各种有用分子的劳动是不正确的”<sup>[20]507</sup>。早期国民党人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是劳资关系协调发展且不会引起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所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 3.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具有空想性与古典主义色彩

中国是一个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农业

国,政治上实行封建专制制度,文化上奉行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古代社会主义思想,如儒家的大同思想和均平思想,也有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早期国民党人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而,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是从中国的传统资源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社会主义思想有共通之处,这种“共通之处”成为国民党人选择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社会思想基础,于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中国传统式的解读。如孙中山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以中国的思想文化资源为基础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尖锐的社会矛盾和贫富差距的状况,将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同主义。他说:

“考诸历史,我国因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社会主义精神”<sup>[19]783</sup>。因此,他认为,欧洲盛行的社会主义“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还没有完全实行,在中国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sup>[19]636</sup>。

总之,早期国民党人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有助于他们理解并传播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相同,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带有空想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早期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局限性一直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其思想中革命与妥协的矛盾,他们以功利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改造三民主义,这一切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作为近代中国首批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士,早期国民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存在些许不足。从历史条件来看,当时阶级条件和思想条件都还不成熟。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还很弱小,当时的中国还缺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土壤,早期国民党人虽然属于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但他们不可能突破阶级属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因此,其局限性实属时代之必然。尽管他们没有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宣传给当时处于迷茫状态的中国人民以重大启发,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其历史贡献不可磨灭。研究早期国民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内涵,更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国共两党的精神契合点,这对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以

及民族复兴的中国梦都有重要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1] 李泽华. 试论“五四”时期中国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传播[J]. 广东教育学院学报, 2007(6):98-100.
- [2] 胡汉民. 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J]. 建设, 1919, 1(5):268-270.
- [3] 沈绍根, 张英智. 从早期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看 20 世纪初中国现代化价值取向[J].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1997(2):36-39.
- [4] 胡汉民. 致马伯援论革命[J]. 建设, 1920, 2(4):198-200.
- [5] 胡汉民. 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J]. 建设, 1919, 1(10):306-308.
- [6] 胡汉民. 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J]. 建设, 1920, 2(4): 290-291.
- [7] 戴季陶. 随便谈[J]. 星期评论, 1919 (11):15-17.
- [8] 戴季陶. 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J]. 建设, 1919, 1(2):30-32.
- [9] 朱执信. 兵的改造与其心理[J]. 建设, 1920, 2(6):50-53.
- [10] 陶季邑. 民主革命派客观上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了积极作用[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2012(4):428-431.
-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97.
- [12]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 孙中山全集:第 9 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465.
- [13] (德)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15.
- [14] (德)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10-211.
- [15] 黎洁华, 虞苇. 戴季陶传[M]. 广东: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255.
- [16] 朱执. 朱执信集:上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10.
- [17] 马君武. 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J]. 译书汇编, 1903, 2(11):15-19.
- [1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选集: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785.
- [19] 孙中山. 孙中山选集:下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782, 783, 636.
- [20] 孙中山. 孙中山选集:第 2 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507.

=====

(上接第 4 页)

- [4] (俄)普列汉诺夫.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M]. 博古,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1965.
- [5] (德)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6] (德)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7] 周树智. 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新世界观:上篇一五评黄楠森先生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J]. 文化学刊, 2011(3):12-21.
- [8] 周树智. 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新世界观:下篇一六评黄楠森先生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J]. 文化学刊, 2011(4):25-36.
- [9]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4:69.
- [10] 黄枬森.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89.
- [11] 周树智. 中国需要新实学[J]. 人文杂志, 1995(2)增刊:7-12.